

历山、马渚、车厩、跽驻…… 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地名

宁波地名谭

徐雪英

和许多地方一样，宁波民间也流传着不少关于古代皇家王族的传说故事。这些传说故事有的还和地方称谓发生交缠，形成一些气派的王族类地名。这些地名多数隐藏在宁波城邑的边缘角落，在让人好奇的同时，也使那些看似寻常的江南聚落有了不寻常的历史渊源。

舜帝与禹帝

有人说，余姚是宁波历史课代表，其不但历史悠久，还人杰地灵，为姚江学派发祥之地。关于“余姚”地名由来，说法多样。

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源于舜帝。《竹书纪年》曰：“舜帝有虞氏，母曰握登，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。”至于姚墟确切位置，却一直未有定论。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在浙江余姚或上虞。余姚兰江街道现有冯村，旧名诸冯，传为舜帝故里。唐《元和·郡县志》卷二云：“虞舜出生，历代郡邑考诸冯人，今浙江越州余姚县，则直以冯村为古城矣。”清代黄宗羲也持类似观点。他在《孟子师说》中云：“今余姚、上虞两县，皆以舜得名。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，亦曰舜江。”

持同样观点的当代宁波学者甚至推测：河姆渡遗址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姚墟。因为遗址出土的干栏式房子、木构水井等，与《竹书纪年》描绘的“舜作室、筑墙、茨屋、辟地、树谷，全民皆知去岩穴，各有家室”的上古生活场景十分相似。

余姚低塘还有历山，以村内原



相传偃息达于鄞山鸟石奈得佛祖舍利塔，遂结茅供奉，其地后俗称“古帝王”。此为古帝王遗址一景。

历山而名。传古时历山北为钱塘江海涂，周边渔民下海捕捞时，常在此山晒网。晒网本地俗称沥网，故得名沥网山，后简称历山。传舜帝还是平民时，曾躬耕于历山之下。光绪《余姚县志》引《康熙志》云：“历山，在县北四十里，有象田、舜井、石床诸迹。山阳石壁镌‘耕隐’二字。有石嵌空横覆如床，可坐数人，相传为帝舜耕时避雨处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余姚在历山大规模开采石材。上世纪70年代时，山体基本被挖空，旧址后建起居民小区，取名舜韵华庭。

海曙高桥镇姚江有三过，村民主姓王，清时从定海迁入。村旁建有禹王庙，因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，把村落取名为“三过”。宁波古属会稽，文献记载，会稽是大禹生前重要的活动之地，也是他最后安葬之地。因此在绍兴、宁波等古会稽之地，和大禹相关的地名和文化纪念物非常丰富。

白云街道丽雅社区境内曾有大

禹王庙，亦称夏禹王庙，传祀大禹和其夫人。大禹在会稽治水时，其夫人曾来鄞西视察水利。后人感禹王夫妻恩德，故建庙奉祀。“夏禹王庙”后被讹化成“谢女王庙”。1996年，因房地产开发，庙宇拆毁。现流经白云、安泰社区附近的庙前河、庙后河等皆缘此庙而名。

秦始皇与勾践

余姚西部有马渚镇，以马渚村而名。马渚古为多水渚地。传秦始皇巡游东至大越时，始皇皇从远到马渚，屯兵渚山之上，饮马于渚。境内尚有饮马渚、饮马桥等遗迹留存。慈溪横河有埋马，传秦始皇东巡观海，曾埋死马于此。也因南宋高宗得马化石而成。1986年版《慈溪县地名志》对这两种传说评价云：“皆因山石像马而附会。”

余姚河姆渡镇还有车厩山、车厩村，地处四明山麓姚江南岸，古为会稽、明州交通要道与军事要冲。光绪《慈溪县志》引《会稽记》云：“越王勾践于此置厩，停车秣马，遗迹犹存，故名车厩。”车厩山上还有柴基坪，旧称寨基坪，传为越王屯兵之处，当地人称“越王练兵台”。又三里许，有巨石似槽般卧伏于路侧，当地人俗称“越王马槽”。

阿育王与其他

奉化溪口镇有跽驻，地处青山叠出、溪流蜿蜒之地。传五代时，有位姓陈的殿中丞隐居于此，吴越王钱鏐还亲往探望。因在此休息小住，故名跽驻。村中原有钱王祠，后改庙。

奉化西坞镇有王府，别名王虎



现阿育王寺古树参天，楼阁众多，地当寺门前一景。(图片均为作者提供)

“清明”和“聪明”

随思录

汪金友

你知道吗，“清明节”也叫“聪明节”。

为什么呢？《中华节令民俗文化》一书解释说，因为“清明”和“聪明”谐音，所以有些人便把“清明节”说成“聪明节”。但我觉得，这事应该与晋文公和介子推的故事有关。

在晋文公最困难的时候，介子推不惧生死，鼎力相助，甚至“割肉奉君尽丹心”。而在晋文公重登皇位、论功封赏时，却唯独把介子推忘了。

所以介子推宁可搭上自己和老母的生命，也“柳下作鬼终不见”。没办法，晋文公只能通过清明节“吃寒食”的办法，来表达自己的痛悔和遗憾。

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载：“春分后十五日，斗指乙，则清明风至。”按《岁时百问》的说法：“万物生长到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清明。”宋代陈元靓在《岁时广记》中也讲：“清明者，谓物生洁净明洁。”

“清”代表着纯洁和安静，“明”含义为光亮和清楚。所以自然界的“清明”，预示着天清似水，地明如镜，春意盎然，气象万千。而政治语境中的“清明”，则象征着条理、法度、透明和公正。

“清明节”告诉我们，为政一定要清明。

清廉，是做人的本分；公正，是治国的基础。无论是治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单位，都不能像晋文公那样，功过混淆，是非不清。提拔谁，奖励谁，表扬谁，都要依据事实和法度而定。很多时候，一件事办不好，就可能伤害一群人，给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阻力。

“清明节”告诉我们，处世一定要报恩。

《增广贤文·朱子家训》中说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感恩不仅给对方带来欣慰，也是感恩者在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。感恩才能知恩，报恩才能感恩。不懂得感恩甚至忘恩的人，往往是私心较重或品质低下的人。在哪条路上，都不会走远。

“清明节”告诉我们，做人一定要孝顺。

有一句古语，叫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在”。等儿女羽翼丰满，想到要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他们却不在。所以每一次扫墓，都是对孝心的洗涤和升华。活时不孝，死后哭天，让别人耻笑，也令自己蒙羞。聪明的办法，就是趁老人健在的时候，常回家看看，尽一点孝道。

“清明节”告诉我们，人生一定要创新。

有一年清明节时，苏轼在密州（山东诸城）写了一首新词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。其中的名句，就是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奋斗就有希望，创造就有未来。趁着年轻，总要想想点什么，做点什么。即便是“怀才不遇”，即便是“施恩无报”，即便是“百事不顺”，即便是“一事未成”，也不要怨天尤人，更不能自暴自弃。抱怨天气的人灰心灰意冷，抱怨别人的人会身陷困境。

当你感觉烦恼和不顺的时候，首先要想的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，走路的方法是否科学。首先让自己聪明，才能创造清明的环境；首先改变自己，才能改造外部的世界。“年来日日春光好，今日春光好更新。”春是希望，春是开始，春是大自然提供给每个人的一次均等的机会。但春色也无情，稍一放松，就会流逝而去。

所以，我们要借“清明节”的契机，让自己更加“聪明”起来，打造一个“清明”的自我，创造一个“清明”的社会。

漫画角



跨“拦”

蓝波绘

反垄断就是反大吗

新知

王东京

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颁布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，而且矛头大多指向大企业。之前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，不明白立法者为何认为企业规模大就是垄断。而让我更感困惑的是，西方各国政府无不希望国内企业做强做大，可同时又反强反大，这岂不是让企业无所适从？

19世纪下半叶，美国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。这些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，碾压中小企业，盘剥消费者，社会各界强烈不满，民怨沸腾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美国1890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——《谢尔曼法》。《谢尔曼法》作为母法，与后来的《克莱顿法》和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》一起，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。

可想而知，美国在那样的背景下推出反垄断法，当然是反大。对于“反大”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。第一个力挺大企业的是

熊彼特。他在1911年出版的《经济发展理论》中指出：“不断的创新，就像是跳动的琴弦，演奏着经济成长的美妙乐章，而拨动琴弦的正是那些领导市场的巨型公司，我们有何理由去指责我们的乐师呢？”后来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，也持相同的观点，认为生产资源集中在大企业，有利于提高大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，应减少对大企业的干预。

回头再看美国反垄断。前面说过，在不同时期美国反垄断的指向不同。《谢尔曼法》颁布后的百年，美国一直是“反大”。转折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。当时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政治上，美国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的威风已不复存在；经济上，昔日迎来的“小羔羊”，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；军事上，苏联又摆出咄咄

逼人的架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美国国内对反垄断产生了争论。而恰逢此时，芝加哥学派得势，其代表人物在政府担任了要职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于是调整了反垄断政策。

此后的20多年，美国基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，政府一反常态，改变了以往的做法。不再“反大”，反而对大企业兼并购推波助澜。1997年，波音与麦道联姻，组成了航空业“巨无霸”。1998年，埃克森与美孚两兄弟在分离了87年之后，再度聚首。1999年，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，缔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国。

当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曾明确讲：“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，但是，如果你滥用垄断权力，法律就会坚决制止。”读者要仔细琢磨这句话。的确，垄断不等于滥用垄断权力。在经济学教科书里，垄断通

常分为三类：行政垄断、自然垄断、技术垄断。毫无疑问，前两类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，容易滥用垄断权力，故需盯紧看严；可技术垄断不同，一家企业技术创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业创新。尊重创新企业的定价权，可以激励创新，当然不能反对。

最后，我想说说美国反垄断带给我们的启示，主要有两点：第一，不能简单根据企业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定义垄断，反垄断并不是“反大”。美国曾有过教训，是前车之鉴；第二，反垄断应重点反不正当竞争，不可将创新企业的定价行为，当作“滥用垄断权力”或“掠夺性定价”予以处罚，要防止反垄断扩大化伤害及无辜。

作者为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原副校（院）长
来源：北京日报

翠屏山畔，“杜东精舍”助学育才

温故

王清毅

南邻翠屏山，西傍杜若湖，旧有兰若，人称普明庵，后更名杜东精舍。

普明庵虽然地处幽僻，但周围茂林深篁，空气清新。鸣鹤一乡，佛庐相望，而士子讲学之所，则自杜洲书院荒废以来，往往寄寓这些佛寺。

清康熙年间，有尚德之人，修普明庵，其弟子祖灯，增置熟田十亩，同时居士罗应聘夫妇来此奉佛，捐筑禅屋，有堂有庑，外加高墙围护。从此，经营的庵田及募化的收入与拓建的梵庐，为贫寒经生士子寄读听讲和乡里设塾课童，提

供了经费补贴与学习条件。清乾隆年间，封翁（封建时代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的长者）陈五峰先生，和蛟川的杨西园前辈，开设普明庵，每届岁科两试，报名者众多，一时最盛。后十余年，主讲席者为必燕山先生，门生有陈双湖、魏竹苑等，先后辉映，成就一段佳话。

春雨夏日秋风冬雪，季节轮回时光流逝，普明庵延绵助学130余年，虽经小修，但难免瓦砾砖松、屋漏壁动、梁柱裂损、檐梢断折，渐成危房。此时，有位杜唐先生，对普明庵深怀母校情结，与族贤五峰先

生一样热心办学。对庵宇的颓败状况，看在眼里，忧在心中，与庵中住持相商，二人竟然想到一处。

因普明庵曾是杜唐先生童子时的弦诵地，虽已更名杜东精舍，但首先捐资，当仁不让，俾住持及时修葺，又嘱其校友、一样热心助学的必平撰写《募修杜东精舍引》。

“精舍”一词最早出于《管子·内业》，唐代的精舍多指佛教的禅院，而宋元明的精舍则指“读书著述的学舍”，这些学舍有的还兼开讲堂。在清代，精舍除了与佛教相关之外，还指设在寺庵供士生

读书、注经、考史的学舍，杜东精舍就是这类学舍。

引，则是一种文体，一般是写在正文前面引领正文，简要介绍与正文的缘起等。必平的这篇引文，或可说是目前仅有的关于杜东精舍的存世文献。它陈述了由普明庵到杜东精舍，自康熙至乾隆间办学助学的兴盛概况与业绩体现，提出因历时已久，房宇已呈颓危之状，吁请公众捐资修葺助学育才。嘉庆年间，必平的《募修杜东精舍引》，由僧四处榜告，众人慷慨解囊，捐资乐助。

走马灯

王真绘

